

蘇聯境內宗教份子的反抗活動

熊 自 健

飽受共黨無神論破壞而殘存的蘇聯宗教，是當今蘇聯社會中唯一具有組織形式來對抗官方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從六十年代起，蘇聯境內的宗教反抗份子，再次掀起反抗「古拉格」制度的熱潮。他們的反抗活動，一方面是加盟蘇聯知識份子的「人權運動」，另一方面是鼓舞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他們成爲蘇聯知識份子與羣衆間的橋樑。本文僅就有限的資料，對蘇聯境內東正教、天主教、回教、基督教浸信會、猶太教積極份子的反抗活動，作一綜合分析。

一、布爾什維主義與宗教

在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中，對於宗教問題的處理，有極大的分歧。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確立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勢不兩立的戰鬥氣質。馬克思以爲：宗教信仰，是人類奴隸制的反映。要解放無產階級，以及解放全人類，必須克服人類相信與依靠上帝的弱點。因此，馬克思提出他著名的口號：「宗教是人民的鴉片。」^①並且努力去改造人的意識，使人成爲戰鬥的無神論者。雖然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披上無神論的戰袍，但是當他們從事工人解放運動時，又不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形成一種新的宗教運動。在此一運動下，無產階級成爲新的「選民」，原始累積成爲新的「原罪」，階級鬭爭成爲新的「聖靈寶劍」，共產黨成爲新的「教會組織」，共產主義社會成爲新的「天堂」。這種馬克思主義世俗化的新宗教運動，在列寧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中，最爲徹底。當列寧取得政權時，由於他的革命運動在本質上已成爲另一種宗教運動，所以他徹底的反對並希望消滅其他宗教，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來取代人民的宗教信仰。因此列寧在處理宗教問題上有以下兩大特點：(1)宗教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

註① 馬克思著，「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恩全集）中譯本第一卷，北平人民出版社，頁四五三。

，不是思想的問題，而是革命的問題。考茨基 (K. Kautsky)、普列漢諾夫 (G. Plekhanov) 等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啓蒙運動的發展，會使宗教信仰自然的死亡；而列寧却強調反宗教的鬭爭，不是科學的啓蒙運動，乃是一種階級鬭爭。(2) 爲了適應俄國人民宗教信仰的虔誠與俄國宗教的複雜狀況，列寧採取機會主義的立場來處理俄國境內的宗教問題。從列寧、史達林、赫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都曾順應革命情勢的發展，隨時調整其宗教政策^②。

六十年來，蘇聯官方所進行的各種反宗教的活動有：(1) 在蘇聯法律上規定政教分離、停止宗教教育、禁止向青年傳教、教會財產收歸國有、剝奪各種宗教聖職人員的參政權。(2) 組織「戰無神論聯盟」(一九二五—四一)、「全蘇宣導科學與政治知識協會」(一九四七)等，從事無神論運動。大規模地關閉教堂、破壞神像、迫害傳教人員，以及進行全國性的洗腦工作。(3) 積極進行經濟建設、文化革命、太空探險，間接打擊宗教。(4) 改造教會爲勞改營、俱樂部，以侮戲教堂的神聖性^③。(5) 在理論上攻擊東正教的「政教合一」制度；攻擊天主教與封建制度以及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結合，共同壓迫被奴役的農人、無產階級；攻擊猶太教的選民觀念與錫安主義 (Zionism)，指責此種思想促使蘇聯境內的猶太人不接受蘇維埃化，並且與國際資本主義勾結；攻擊回教的「一夫多妻」制，提倡婦女解放等^④。

面臨蘇聯官方一波又一波的反宗教鬭爭，蘇聯境內所殘存的宗教，大致上都痛苦的經歷了三個階段：(1) 反抗，(2) 中立，(3) 妥協；一步一步的靠向蘇聯政權，充當蘇共的統戰工具^⑤。然而在妥協聲中，却也激起了虔誠教徒的抗議。在抗議的教徒中，有以下四種型態：(1) 保持個人信仰，不參加任何教會活動；(2) 組織地下教會活動；(3) 依舊參加合法的教會活動，但對領導階層表示不滿；(4) 積極反抗^⑥。

二、蘇聯宗教份子的反抗活動

蘇聯境內的教徒人數，據一九七〇年的估計，東正教約爲五千萬，回教三千萬，天主教五百萬，猶太教二百二十萬，基督教

註② 蘇聯的宗教政策與其安全政策、農業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息息相關。請參閱：「蘇聯的宗教政策」(匪俄問題譯叢，二七六期 B. R. Bociurkiw,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he USSR", *Survey*, 1968, Jan. pp. 4-32. L. Haroska "Soviet Policy Toward Religion After 1942" ed. by B. Iwanow, *Religion in the USSR*, (Muni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1960) pp. 7-28.

註③ 蘇聯官方反宗教鬭爭的手段，請參閱 W. Kolarz, *Religion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1) pp. 6-33.

註④ 蘇聯共產黨反宗教理論鬭爭爲一長期計劃，目前由黨校所設置的科學無神論研究中心負責。培養大批的職業打手。從一九六四—七〇年所出產的反宗教碩士、博士論文共有四百八十篇。出版定期刊物：「科學與宗教」、「戰無神論」等。

註⑤ B. R. Bociurkiw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he USSR", *Survey*, 1968, Jan. pp. 14-15.

註⑥ B. W. Jancar "Religious Dissent in the Soviet Union" ed. by R. L. Tokes, *Dissent in the USS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08.

浸信會五十萬。東正教徒主要分佈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等加盟共和國；回教徒主要分佈於中亞諸國；天主教徒主要分佈於波羅的海三小國與烏克蘭；猶太教徒散佈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別克、蒙大維亞、喬治亞、波羅的海三小國；基督教浸信會徒衆主要分佈於烏克蘭與蒙大維亞。無可置疑的，蘇聯境內的宗教仍是一股龐大的力量，尤其是每一宗教都有國際的支持；但是如何在蘇共的控制下，動員這股力量，爭取完全的信仰自由與政教分離，並進而反抗共黨統治，則非易事。

從六〇年代起，蘇共再次積極進行反宗教鬥爭，激起了蘇聯宗教積極份子的反抗。他們的反抗活動，表現於一方面加盟於蘇聯知識份子的「人權運動」，另一方面鼓舞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因此，他們成了蘇聯知識份子與羣衆的橋樑，他們的抗議活動發揮了三種功能：(1) 反對官方的意識形態；(2) 關心人權問題；(3) 保存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一般而言，東正教與基督教浸信會的積極反抗份子較爲關心人權問題；猶太教與回教的積極反抗份子試圖保存傳統文化；天主教積極反抗份子則兼而有之。以下我們來簡評他們的反抗活動。

1. 東正教

東羅馬帝國滅亡後，俄羅斯沙皇接收了東羅馬拜占庭的雙頭鷹國徽，作第三羅馬，實行「政教合一」制，東正教被尊奉爲國教。列寧革命成功後，深知東正教的影響力，先是儘量避免與東正教衝突，以防止東正教投入反革命陣營，繼而試圖分化東正教，強調東正教與共產主義並存的理論，意欲吸收東正教的妥協份子爲蘇共的統戰工具，另一方面則對宗教教育、制度以及教堂，進行破壞，以收恐嚇之效。一九二六年莫斯科新任大主教色濟(Sergii)率先表示效忠紅色政權。一九二七年東正教與蘇共達成默契——「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紅色政權正式成功的利用東正教進行內外的統戰^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四一—四五)雙方共同爲保衛祖國而奮戰；戰後(一九四五—四八)雙方共同爲「第三羅馬」而努力，達到合作的最高潮。

莫斯科大主教色濟於一九四四年逝世，東正教舉行了第一次蘇聯東正教選舉主教大會，選出阿列克西(Aleksii)爲莫斯科大主教及全蘇東正教總主教。在阿列克西主政期間(一九四五—七〇)，東正教恢復了兩所神學院，八個討論會、二萬個教會，以及培養數以千計的聖職人員^③。過份擴張東正教勢力的後果，遭到蘇共無情的整肅。一九五九—六一年赫魯曉夫大肆整肅東正教，關閉一萬個教堂，阿列克西無力對抗，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召開東正教主教大會。大會目標在順從赫魯曉夫的整肅，要求降低教會的獨立性，增加政府的控制。會中決定設置地方教會特別管理委員會來管理教會事務，牧師只從事精神工作。此一措施，曾遭到東正教積極份子的嚴重抗議。

註② 關於莫斯科大主教的統戰功用，請參閱 Y. Marin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in Soviet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Bulletin*, Vol. VIII,

No. 2, 1961 Feb. pp. 32-38.

註③ 關於阿列克西的生平事蹟，請參閱 N. Teodorovich "Patriarch Aleksii (1877-1970)" *Bulletin*, Vol. XVII, No. 5, 1970, May, pp. 29-36.

首先公開發難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莫斯科副主教牧師葉尼曼 (N. Esliiman) 與雅枯寧 (G. Yakunin) 聯名上書阿列克西，指責他在一九五九—六四年對蘇共非法破壞東正教保持沉默。十二月兩人再聯名上書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與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要求蘇聯當局遵守憲法所定政教分離原則，爭取憲法所賦予人民有信仰自由的權利^⑥。此二人被阿克列西開除教會。

支持葉尼曼與雅枯寧的抗議並作理論性的批評者，以莫斯科副主教塔蘭諾夫 (B. Talantov) 與卡蘭斯諾夫 (Kransnov) 最為出色。塔蘭諾夫在一九六七—六八年寫了三篇重要的論文，其中「與無神論者妥協」一文，批評蘇聯東正教與蘇共妥協，造成一個二分世界，等於拱手把地上的事務交給蘇共去解決，眼睜睜看着蘇共整肅東正教而無能為力，並謂共產黨的諾言是不能保護教會的。「秘密參與」一文指責東正教某些教區主教秘密參與共產黨活動，完全是背叛東正教信仰。「蘇聯社會：一九六五—六八」一文批判蘇共成為新階級，控制了政治、經濟與思想的壟斷權，並指責新階級政權墮落，使得人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社會的天堂，認為蘇聯人民將重返神聖俄羅斯天國。塔蘭諾夫於一九六九年以反蘇宣傳罪名被捕，一九七一年病死獄中^⑦。

卡蘭斯諾夫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上書阿列克西，批評他所領導的東正教是一個病態的宗教，女性化的宗教，要求阿列克西領導東正教為信仰自由而戰鬥。卡蘭斯諾夫強調「神聖俄羅斯」的傳統，要從昨天維持到明天^⑧。

東正教的積極份子並與莫斯科人權運動相結合。卡蘭斯諾夫抗議蘇聯作家金斯堡事件，抗議左翼不滿份子領導人物格里郭倫科被關入精神病院，並與沙卡洛夫互通聲息。卡蘭斯諾夫於一九七一年被捕，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東正教的積極份子大都採取個人行動。一方面顯示出東正教有嚴格的紀律與組織，不易動員羣衆；另一方面顯示出他們主要奮鬥的目標是在人權問題與東正教命運。

2. 基督教浸信會

俄國在東正教長期的統治下，堅決排斥西方天主教與基督教進入俄國。基督教浸信會 (Baptists) 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才進入俄國的邊陲地帶傳教。一九〇八年俄國浸信會成功的組成全俄基督教浸信會聯盟，併合了福音會教會。十月革命後，浸信會拒絕接受紅色政權，慘遭蘇共迫害。到了一九三五年蘇聯境內浸信會停止一切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由於史達林與英美的同盟關係，全俄浸信會聯盟再度復活。一九四四年浸信會與福音會組成聯盟 (AUCECB)，並且與蘇共和平相處。一九六〇年 AUCECB 修改組織章程，違反該教會傳統的民主精神，激發浸信會積極份子的反抗活動。

註⑥ R. D. Konstantinow "Futher Proof of the Incontrovertible" *Bulletin*, Vol. XIII, No. 7, 1966. July. pp. 31-36.

註⑦ J. B. Dunlop, "Dissent Within the Orthodox Church: B. V. Talantov" *Russian Review*, Vol. 31 No. 3, 1972. July. pp. 254-259.

註⑧ N. Teodorovich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Bulletin*, Vol. XIII, No. 12, 1966. Dec. pp. 17-20.

一九六一年，由普羅柯菲夫 (A. Prokofiev) 與克魯烏奇柯夫 (G. Kryuchkov) 所領導的浸信會反抗團體，公開抗議浸信會的領導。其主要的抗議內容為：(1) 反對蘇聯政治干涉宗教，請求蘇聯最高當局尊重憲法所定政教分離原則。(2) 反對浸信會所修改的組織章程，呼籲召開全蘇浸信會宗教大會來處理宗教事務。(3) 請求修改宗教法，廢止學校無神論教育，允許對蘇聯兒童與青年傳教。一九六二年普羅柯菲夫被捕，判處五年徒刑，外加流放五年。一九六五年克魯烏奇柯夫上書布里滋涅夫，請求修改憲法第一二四條。一九六六年五月，五百名浸信會積極份子在莫斯科蘇共中央委員會大廈前示威，請求蘇聯最高當局允許他們召開全蘇浸信會（包括沒有註冊的浸信會）的宗教大會^⑩。

基督教浸信會積極份子的奮鬥目標如同東正教反抗份子一樣，也集中在宗教內部的領導與人權問題上，所不同的是：(1) 基督教浸信會積極份子以組織化的行動來要求蘇聯憲法所賦予的人權並組織地下領導中心來打擊向蘇共妥協的浸信會。(2) 對於蘇聯憲法與宗教法所做的分析，旨在反對政治干涉宗教，不同於東正教積極份子有「神聖俄羅斯」的理想。

3. 猶太教

蘇聯境內的猶太教問題不僅僅是價值體系衝突的問題，最主要是少數民族問題，也就是所謂猶太人問題。

猶太人從開始流亡的日子起，就在敵視的世界中尋求民族的生存與獨立。猶太人歷經艱辛保持其獨特的文化。在世界上每一個猶太區，都有猶太人的教堂與學校，把猶太人的法典與文學，一代傳給一代。

猶太人的民族特性，簡而言之，就是上帝精神與國際商業精神。上帝精神是他們在苦難中保持其民族的自尊、安慰與希望的精神力量。國際商業精神是他們在敵視的世界上謀生最好的本領。

馬克思對於猶太人問題提出了解決之道。他認為猶太人的解放是宗教國家之中人的解放問題。一方面是政治解放，另一方面是精神解放。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處理：在德國，它是神學上的問題，在法國，它是憲政上的問題，在美國，它是世俗的問題。他並認為猶太人實際上已經解放了他們自己，因為歐洲各國人民的內心已經猶太化，已接受了猶太人的商業精神與上帝精神。所以猶太人的解放，就終極意義說，就是人類從猶太精神中獲得解放。而上帝精神與商業精神都是人類「異化」的現象，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夠成功的解決異化問題。因此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宣佈蘇聯境內無猶太人問題^⑪。

經過蘇聯努力同化猶太人的結果，蘇聯境內的猶太人產生三種不同的認同：(1) 認同蘇聯，同化為蘇聯人；(2) 認同猶太教，但為蘇聯公民；(3) 認同錫安主義，猶太人自己重建祖國^⑫。

註⑩ R. D. Konstantinow "Interesting Parallels" *Bulletin*, Vol. VII, No. 4, 1967. Apr. pp. 43-47.

註⑪ J. Miller, "Soviet Theory on the Jews" ed. by L. Kochan,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nd ed), pp. 46-47.

註⑫ R. Medvedev "Jews in the USSR", *Survey*. Vol. 17, No. 2, 1971. Spring pp. 196-200.

蘇聯大規模的迫害猶太人，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一方面由於國際資本主義幫助猶太人復國，鼓舞蘇聯境內的猶太人脫離蘇聯；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史達林藉猶太人問題，充當其恐怖政治的代罪羔羊。一九五二年猶太醫生謀殺案爆發，達到蘇聯反猶的最高潮。所有的猶太教堂、學校、劇院都遭關閉，猶太人被解僱，一批批的關入「古拉格」。迫害猶太人的結果，造成認同錫安主義的猶太人大增，產生了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問題¹⁵。

蘇聯境內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問題，曾在蘇聯的人權運動中大放光彩，並使蘇聯最高當局抱有隱憂。同意猶太人有權移民以色列勢將促使蘇聯境內各少數民族提出相同的請求，這會動搖蘇聯各民族友好的神話，進而鼓舞各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同時大量移出猶太人會造成蘇聯人才的損失與安全的顧慮。於是蘇聯最高當局一方面進行反錫安主義的宣傳，把以色列形容為一個法西斯國家、把錫安主義形容為國際帝國主義的陰謀，另一方面孤立處理移民以色列問題，從一九七一年起允許個別的錫安主義者偷放出國¹⁶。

有長期流放經驗的猶太人，在行動上充分顯示出組織性與目標取向。全球的猶太人共同對蘇聯行使壓力，要求釋放關在「古拉格」內的猶太人，停止迫害猶太文化，並且主張猶太人有權移民以色列。這種國際壓力，以一九七三年賈克遜（H. Jackson）修正案達到最高潮¹⁷。掌握世界金融與輿論的猶太人迫使蘇聯當局逐漸讓步，但是狹窄的猶太主義忽視了蘇聯境內其他民族的人權問題。猶太教在這場鬭爭中，扮演了認同傳統文化的角色，也粉碎了馬克思主義解放猶太人的夢想。

4. 回教

有關蘇聯境內回教問題的資料，在自由世界非常缺乏，其原因不外是：(1)蘇聯當局禁止外國訪客觀光訪問中亞諸民族；即使允許，觀光訪問的時間也非常短暫，不易深入地與回教徒接觸，瞭解回教內部情形。(2)蘇聯回教本身缺乏有系統的整理資料，更少與西方保持聯絡。(3)蘇聯官方對於回教缺乏一套有體系的批判理論。馬克思主義對於回教是完全外行，導致蘇聯御用打手在處理回教問題上矛盾叢生。例如探討回教的社會基礎上，就有商業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部落貴族社會等諸學說，無法自圓其說，只有在婦女解放問題大作文章。因此，官方的資料也同樣地缺乏¹⁸。

蘇聯當局對於回教的宗教政策，完全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來運作。列寧利用「民族自決」的口號，煽動回教諸民族挺身反抗

註¹⁵ *Ibid.*, p. 185-187.

註¹⁶ P. Lewis "The Jewish Question in Open: 1968-71" ed. by L. Kochan *op. cit.* pp. 337-352.

註¹⁷ 賈克遜修正案為美國國會參議員賈克遜對美國與蘇聯商務法的修正案，即美國給予蘇聯貸款與最惠國待遇附有一附帶條件，必須保障移民權利之實施。See

W. Korey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Problems of Jewish Emigration Policy" *Survey*, 1976, Spring, pp. 122-127.

註¹⁸ W. Kolarz. *op. cit.* pp. 400-406.

沙皇的俄羅斯沙文主義，削減了沙皇的力量。待紅軍內戰勝利後，列寧再血腥地奪取中亞回教諸國，組成蘇維埃聯邦政府，同時針對回教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採取「分化」與「等待」政策。列寧把回教徒分為新舊兩派，高唱新派回教徒可以與社會主義共存，發展回教的社會主義；容忍回教徒共產黨員保留信仰，在組織會議中進行宗教儀式。列寧深知回教世界是反資本主義的後備軍，會從殖民地覺醒，實行反帝民族革命，因而保留回教，以利革命的號召與世界革命的進展^{①9}。

史達林當政後，為推動農業集體化運動，曾發動大規模的反宗教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及大戰後，蘇共與回教共同為祖國而戰，為史達林的擴張政策而努力；回教如同東正教一樣，成為蘇聯對內對外最好的統戰工具。回教的利用價值一天天的看漲，蘇共對回教的反宗教鬥爭也就一天天的降低。

經歷了六十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亞諸國現代化成功，而其反蘇地方民族主義亦漸興起，回教成為反蘇地方民族主義份子向傳統文化認同的對象。其後國際局勢的演變，更加有利於回教的發展，如：蘇聯與中共的衝突、阿富汗事件，促使蘇聯當局更加討好中亞諸國，在蘇聯法律的範圍內，對回教加以容忍，於是回教的力量一天天的增大。

回教積極份子目前的活動，除了克里米亞韃靼人要求返回故居外，更表現在保留鄉土文化方面。中亞諸國的回教組織，五大信念（信仰阿拉、祈禱、佈施、齋戒、朝聖），以及哲學教義等都完整的保留下來，成為地方民族主義的一股力量^{②0}。如果蘇聯當局對回教進行殘酷的反宗教鬥爭，必然會遭到回教信徒強烈的抗議。

5. 天主教

天主教是遭受蘇聯當局迫害最為嚴重的一支宗教，基本原因有三：(1) 反天主教鬥爭是蘇聯民族政策的一環。蓋因蘇聯境內信仰天主教的民族，如波蘭人、德國人、波羅的海三小國民族，都有強烈親西方的傾向，堅決反抗蘇維埃化，尤其反對文化革命。天主教的組織嚴密，紀律森嚴，構成蘇聯當局推行蘇維埃化政策的最大障礙。(2) 蘇聯指揮第三國際推行共產主義國際運動，天主教運用其國際影響力加以阻止。依共產黨的觀點，天主教與資本主義結合成反動陣營，為共產黨最大的敵人。(3) 俄羅斯民族傳統的偏見。一〇五四年基督教體系內的希臘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大分裂，此後互不相容。依韋伯 (Max Weber) 的觀點，這是任何宗教運動必產生的「宗派主義」。宗派主義份子的心態是不能容忍異議或反對，只想把自己的概念播之於世界。因此，在長期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民族，傳統上敵視天主教。蘇共為打擊其第一號宗教敵人天主教，不惜與東正教達成統一戰線^{②1}。

當希特勒政權興起之後，克里姆林宮瞭解到蘇聯的最大敵人不是天主教與資本主義，而是法西斯，於是開始放鬆反天主教鬥爭，組織人民戰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史達林揮兵東進，收復波蘭的經驗使他瞭解共產黨與天主教和平共存的利益。一九四

^{①9} *Ibid.*, pp. 406-416.

^{②0} See B. Hayit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ABN. Correspondence* Vol. XXX No. 4, 1979, 7-8, pp. 34-39.

^{②1} W. Kolartz, *op. cit.*, 176-178.

四年史達林兩次接見波蘭神父奧連曼斯基（Oriemansky），開始對天主教進行統戰工作。大戰結束後，蘇聯為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與赤化東歐，暫停反天主教鬥爭^②。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事件使蘇共政權明瞭華盛頓與梵蒂岡繼續合作，阻止蘇聯的擴張，進行蘇維埃集團內部的顛覆活動。因此蘇共又加強反天主教鬥爭，嚴防信奉天主教的少數民族獨立。在鎮壓的過程上，遭受立陶宛天主教份子的反抗。

立陶宛天主教份子的反抗活動中最為出色的有：(1)由一萬七千名教徒聯名簽署一封抗議信，致送聯合國秘書處，抗議蘇聯當局對立陶宛的民族歧視。(2)抗議立陶宛天主教神父被捕，教會遭受破壞。(3)自殺抗議。例如在尼克森訪蘇前夕有一名反抗份子自殺抗議，造成暴動事件^③。

立陶宛天主教份子的反抗活動，兼具人權運動與民族獨立運動的雙重使命，其活動的方式介於東正教反抗份子個人行動與猶太教組織化行動之間。他們從事組織化的行動，但不若勢力龐大的國際猶太集團行使壓力，只靠他們的獨自奮鬥；同時在個人行動上除了書面或公開示威的方式之外，還運用了自殺的手段。毫無疑問，他們接受十字架的啓示走在自我犧牲的路上。

三、蘇聯宗教份子反抗活動的評估

以上我們簡單的評述了蘇聯當局的宗教政策與蘇聯宗教份子的反抗活動。我們可以觀察出雙方鬥爭的焦點在人權問題、價值體系以及宗教內部的事務。雖然蘇聯境內所殘存的宗教，是蘇聯社會中唯一具有組織形式來對抗官方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但是在蘇聯嚴密的控制與機會主義策略的運用之下，並不能充份發揮其組織的功能。目前的成就僅在於聯援人權運動與民族獨立運動，成為蘇聯知識份子與羣衆之間的橋樑。今後的努力，作者以為應循下列三個方向進行。

第一促進宗教組織民主化。沒有民主化的組織，難以發揮羣衆的力量。今日蘇聯的羣衆已不是封建時代的農人或初期資本主義的工人，而是受過國民教育與技術訓練的工農。他們生長於集體化的環境，深切明瞭組織的重要，以及官僚體制的弊病，也深切瞭解民主化是自救之路。基督教浸信會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已經邁出了脚步，相信其它宗教的份子亦會迎頭趕上。

第二發揚使徒的精神。我們知道基督教初期的奮鬥以及勝利，是使徒們發揚十字架堅苦卓絕、忍耐犧牲的精神而獲得成果。如今蘇聯當局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各宗教更需要發揚使徒的精神，奮戰到底。妥協的代價，只會帶來信仰的破滅，因為共產黨的諾言是無法保衛教會的。

第三加深思想工作。馬列主義有魅力的地方在於其思想體系，只堅守宗教的教條是不足以與之鬭爭的。我們熱切的盼望蘇聯宗教思想界再出現如蘇洛維也夫（W. Solovyev）、貝查也夫（N. Berdyaev）等偉大的宗教哲學家，對於無神論與蘇聯制度提出全面性的批判，帶領蘇聯人民走出「古拉格」，重建人類神聖的殿堂。

^② *Ibid.*, pp. 188-197.
^③ B. W. Jancair, *op. cit.*, pp. 22-23.